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从埃及看中东变局

吴冰冰

摘要：埃及局势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的严重失业和贫困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加剧；长期的亲美、亲以外交引发民众不满和街头抗议。埃及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综合发展模式、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变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埃及在外交上将采取更为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立场，与土耳其等国组成中立阵营。亲美、反美、中立三个阵营并立，伊朗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相互竞争，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中东变局将催生新的战略格局。

关键词：中东变局；北非；美国中东政策；战略格局

作者简介：吴冰冰，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01（2009）03-0020-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在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五个中东大国中，埃及是至今唯一在中东变局中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埃及局势变化对中东乃至全球的影响以及这一变化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使得埃及成为此次中东变局的核心。本文尝试以埃及为出发点来观察此次中东变局，探讨变局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变化的走势及中东战略格局的变化趋向。埃及政局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在政治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在经济社会方面，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引发严重的失业和贫困，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社会矛盾；在外交方面，穆巴拉克长期实行的亲美、亲以外交成为点燃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一、专制统治与全球化挑战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政治体制是军人出身的文职总统，以军人集团为核心，以武装力量为基础，实行专制统治。1952年埃及革命以来，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尽管他们在担任总统后都改为文职身份，而且在埃及也不是军队直接控制政权，但“历届政府和历任总统都依赖军队提供稳定、权力和控制，他们同时也要满足军队的利益和高级军官的特权。”^{[1]289}2011年1月29日，穆巴拉克为了应对街头抗议，不得不任命一位副总统，获得任命的是前军官、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奥马尔·苏莱曼。这充分说明了军人集团在埃及政治中的核心作用。

军人集团掌握权力核心，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并没有形成制约军人集团的有效力量。1952年自由军官领导革命成功，由军人组成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权力，军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广泛

的作用。纳赛尔先后创立的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要是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机构。萨达特于 1974 年宣布实行多党制，1978 年创立民族民族党。这个党事实上是萨达特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政府依赖情报和安全系统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执政党作用有限。长期严峻的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956、1967、1973 年，埃及先后经历了三次中东战争。在 1979 年埃及和平条约签订之后，埃及的战争威胁减少，但国内的安全威胁增大。1981 年萨达特遇刺，九十年代恐怖袭击严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得以保持和强化。穆巴拉克上台后，军队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独立性增强，这巩固了军队在政治体制中的强势地位。

从萨达特时代开始，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日益模糊。在纳赛尔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 1971 年宪法第一条规定：“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执政理念调整为亲西方、亲以色列的政治立场和日益与西方融合的市场经济，但宪法第一条的规定一直保留到 2007 年，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民主制国家”。政治实践与宪法规定的长期背离，决定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混乱，这严重限制了埃及民族民主党的政治动员能力。

军人集团没有有效政党制约并且拥有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力量，成为埃及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缺失，使得对于权力的攫取和控制成为军人集团的主要目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穆巴拉克及其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不断强化自身的专制统治。

穆巴拉克在埃及长期实行紧急状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肆意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埃及的政治反对派也遭到强力压制。埃及的反对派主要包括以新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团结统一进步集团为代表的左翼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政治势力。穆巴拉克政府对反对派进行严厉压制，这突出表现在议会选举中。在 1984 至 2000 年的 5 次议会选举中，除 1987 年外，执政党获得的议席都在 86% 以上，1995 年更高达 94%。2005 年的议会选举，反对派在 454 席的议会中赢得 95 席，占 21%；而在 2010 年的选举中，反对派议席降为 15 席，曾在 2005 年选举中赢得 88 个席位的穆斯林兄弟会竟然一席未得。

埃及的政治高压，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主要是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和以互联网及手机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1990 年 12 月，卫星电视频道开始进入中东。1996 年“半岛”电视台开播，其高度的开放和自由强烈冲击了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随着对“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其他阿拉伯热点问题的报道，“半岛”电视台在中东的影响与日俱增。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在阿拉伯世界不断营造着政治变革的气氛。与此同时，互联网和手机在埃及也得到迅猛发展，网民占总人口比例从 2008 年的 12.9% 上升到 2010 年的 28%，网民总数达到 2300 万，使用手机的人数则达到总人口的 40%。网络和手机为埃及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新的动员手段和活动平台。2008 年，以网络为主要动员手段的“四六青年运动”出现；2010 年，反政府的 Facebook 群体“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出现。这些网络群体和“半岛”电视台在埃及变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1 年 1 月 25 日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之后，埃及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关闭“半岛”电视台驻埃及办事处和切断网络的方式加以回应。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政治空间和网络政治手段，对于利用网络手段、通过网络空间活动推动现实社会政治变革的新兴反对派政治力量，埃及政府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法。与此同时，埃及政府对于传统反对派的长期打压，客观上为网络反对派群体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全球化的挑战，在埃及长期的专制统治和政治高压中撕开了裂缝，一批中产阶级青年网络活动分子涌现出来，并发展成新兴反对派。

二、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与金融危机冲击

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困难之后，1991年埃及开始经济改革，主要目标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包括自由化和私有化）、采用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对外部竞争开放以强化埃及经济与世界的一体化、鼓励出口以及增加经济对国内税收的依赖”^[2]。1997年卢克索恐怖袭击事件及东亚金融危机和相应的国际油价下跌，对埃及经济改革进程形成冲击，改革节奏放缓。2004年，艾哈迈德·纳齐夫担任总理后，埃及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再次提速，私有化和金融领域是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促进了埃及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07至2009年分别达到6.8%、7.1%、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4年的1089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65美元。

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埃及依然被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所困扰。1991年，埃及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4.3%，2000年下降到16.7%，2008年又回升到20%^[3]。严重的贫困问题与高失业率联系在一起。2000年埃及失业率为11.8%，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07~2009年依然高达10.3%、9.1%和8.4%。埃及文盲率高达总人口的40.8%，成为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脱节，主要原因在于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埃及政府没有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埃及人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8300万，每年新增约70万至80万劳动力。2009年，15岁以下人口占埃及总人口的比例为32%。

埃及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埃及现行经济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37.6%和48.7%，分别吸纳了约20%和50%的劳动力。在工业中，主要的产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在服务业中，旅游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由于旅游业与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并提供稳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7至2005年，埃及创造了43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制造业只创造了8.5万个就业机会。^[4]农业尽管吸纳了30%的劳动力，但占GDP比重仅为13.7%。埃及粮食长期不能自给，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60%的小麦依赖进口。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将埃及通货膨胀率推高到9.5%，2009和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则高达18.3%和11.9%。埃及的高通胀“主要是危机之下发达经济体货币扩张所导致，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发达国家的信用扩张，导致了全球通货膨胀，而由于这种通货膨胀的全球性，使得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承载了发达国家危机代价的转嫁。”^[5]

失当的产业政策使失业率居高不下，薄弱的农业基础导致粮食不能自给，大量粮食进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二者叠加使贫困问题更加严峻。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困反而加剧，埃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三、失衡外交与抗议运动

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签订以来，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始终坚持亲美路线。因为与以色列媾和，20世纪八十年代埃及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孤立。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反对以色列的伊拉克受到军事打击和制裁，美国开始在中东确立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东和平进程出现突破。随着美国对两伊“双重遏制”战略的出台，以埃及、沙特为核心，包括约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国家在内的亲美阵营成型，美国在中东独霸的地位也逐渐确立。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随着伊朗核问题升温和伊朗崛起局面的出现，一方面，以伊朗为核心，形成了包括叙利亚、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的反美阵营；另一方面，出现了从伊朗经伊拉克南

部延伸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以埃及、沙特为首的亲美阵营和以伊朗为首的反美阵营之间的对立，同时被赋予了教派矛盾的色彩。巴以和平进程裹足不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立加剧，促使穆巴拉克政府采取了更坚定的亲美、亲以立场。这一立场完全无视埃及民众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民族宗教感情，招致民众不满。对美国压制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人的不满，转化为对埃及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满，这些不满与对埃及国内政治高压和民生问题的不满相结合，成为点燃大规模示威抗议运动的导火索。“九十年代埃及政治的沉闷，以及埃及当局对埃及政坛各种力量的压制，促使政治运动在随后的阶段利用外部因素来发动对国内问题的抗议。”^{[6]199}

2000年9月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在埃及国内引发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示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再次引发埃及民众的抗议。2006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战争，穆巴拉克政府指责真主党，埃及民众则上街游行支持真主党。一方面，针对外部问题的示威游行打破了政府的政治高压，民众逐渐掌握了如何将示威游行作为表达意愿的手段；另一方面，示威游行开始转向针对埃及政府，并逐渐转向埃及国内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06年12月7日爆发了大迈哈莱纺织业工人的罢工。2006年12月的罢工是个转折点，工人运动明显增多。从2006年12月7日到2007年9月23日，全埃及工人示威游行超过650次。^[7]2007年9月23日，大迈哈莱的纺织工人组织了第二次罢工。游行示威逐渐从针对外部问题转向针对内部问题，从反对外国政府转向反对埃及政府，游行示威的高度自发性使其摆脱了与传统反对派的关系，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普通民众找到了突破埃及政府政治高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诉求，在埃及社会现有政治力量中找不到代言人。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埃及执政理念的转变，左翼军官集团转化为右翼军官集团，左翼政治势力受到压制；九十年代，随着苏东剧变，左翼政治势力的影响力进一步萎缩。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执政的右翼军官集团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自由派右翼反对派势力也受到打压。下层民众的诉求在左右两翼的政治势力中都找不到强有力的代言人。随着全球化挑战而出现的新兴网络青年政治反对派，自然而然将下层民众视作反对专制统治的同盟军。在2008年4月6日大迈哈莱工人大罢工中，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经济社会诉求，与网络青年运动相结合，成为最终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主要力量。

四、埃及局势演变趋势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平衡，积累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模式的探索则是更为艰巨的挑战。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粮食进口依存度高，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二者叠加引发严重的贫困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增加就业、大力提高粮食自给率以抵御通货膨胀，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这些政策还涉及到传统文化观念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如果不能有效缓解经济社会问题，都无法长久持续。此次变局的发生，表明民众已经失去耐心，而示威游行则成为表达不满的有效手段。鉴于任何政府都无力在短期内有效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埃及政局将面临持续动荡，而动荡本身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改善民生是关键，但民生的改善要求稳定的政治体制和的社会局势。

确立可持续的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是又一个严峻挑战。修订甚至重新制订宪法以及组织选举，本身并不能自然带来这样的政治体制。在埃及政治力量的格局中，主要包含四种力量：军队、穆

斯林兄弟会、世俗政党和以青年运动、工人运动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世俗政党在穆巴拉克政府的长期压制之下，势力非常弱小，短期内不能主导埃及政治；新兴政治力量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当前埃及政治中的两个主要力量，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埃及的政治格局。在中东国家，军队与宗教力量的关系一直是决定政治格局的核心因素。在伊朗，以最高领袖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和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之间是结盟关系，这成为伊朗政局稳定的关键。在埃及，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决定了埃及政局将充满变数。

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复杂的政治力量格局，决定了变化的长期性。目前仅是中东国家探索国家综合发展模式新阶段的开始，中东变局将在持续动荡中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果此次变局能促进埃及民意更真实的表达，那么在国内政治领域，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治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外交领域，埃及将实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而言，一是在国内政治领域，埃及将不得不探索“伊斯兰民主”的内涵。在一个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伊斯兰在政治中不发挥任何作用是不可能的。在伊朗，由选举所代表的民主和由宗教学者所代表的伊斯兰，构成政权的二元合法性基础。埃及新的政治体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作出回答。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体制，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二是在外交领域，埃及将不可能再像穆巴拉克时期那样采取全面的亲美、亲以政策。开罗美国大学教授贾拉勒·艾敏（Jalal Amin）在其专著《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和埃及人》中指出，过去 30 年埃及亲美外交的结果是“埃及的政治地位、国际地位和在中东国家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以牺牲埃及和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了以色列一个又一个的利益，埃及经济形势也显著恶化。”^{[8]250}埃及民众的诉求和埃及的国家利益要求实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埃及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变化的端倪。新政权在 2011 年 2 月已允许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通过斡旋促使法塔赫和哈马斯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开罗达成和解协议，2011 年 5 月 28 日又宣布永久开放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埃及与伊朗将改善关系的消息也频频传出，伊朗议会特使布鲁吉尔迪已于 2011 年 8 月 8 日访问了埃及。

五、中东战略格局调整

中东变局发生之前，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是“美国谋求霸权、两个阵营对立”。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退出了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通过“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确立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通过对反美的伊朗、伊拉克两国的遏制，以及支持沙特、埃及等亲美国家，美国力图孤立和压制中东反美势力，鼓励中东伊斯兰国家走亲美的道路。阿以矛盾一直是美国发展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障碍，为此美国在九十年代初开始进一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此背景下，1991 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启动，1993 年巴以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 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通过“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美国力图推动尽可能多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亲美、亲以的基础上组成亲美阵营。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在 2002 年先后提出了“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在 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通过进攻性的战略推翻了反美的萨达姆政权，谋求强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但是，这一过程本身也蕴含着削弱美国霸权地位的因素。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形势持续动荡，国内教派矛盾凸现。伊拉克逊尼派由于在人口中的少数地位，不得不寻求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伊拉克的什叶派倒向伊朗。萨达姆政权倒台和伊拉克的弱势地位，消除了伊朗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打破了两伊之间相互制约

的平衡，帮助伊朗崛起。崛起的伊朗成为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共同威胁，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以沙特、埃及为首，包括约旦、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构成亲美阵营，这个阵营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以伊朗为首，包括叙利亚、真主党和 Hamas 构成反美阵营；土耳其站在两个阵营中间，并且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领导下逐渐向后一个阵营靠拢。伊拉克遭到削弱而产生的真空，事实上由美国加以填补。美国“东遏两伊”战略中本来蕴含着两伊相互制衡的因素，而这种制衡被伊拉克战争打破。两个阵营对立的格局，不仅消耗了美国大量资源，而且减少了美国中东战略的弹性空间。在这个格局中，美伊（朗）矛盾成为核心，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只能走向全面对抗或全面和解，中间地带越来越狭窄。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对手。自 2000 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以色列国内安全的严峻挑战，在 2001 年“9·11”事件之后与美国的反恐战争挂钩。以色列借此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在阿以和平进程中处于绝对强势，拒绝在和平进程中做出实质性让步，其结果是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在两大阵营对立和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的局面下，埃及政府采取了全力支持和配合以色列的立场，而这一立场与民众的情感尖锐对立。正是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穆巴拉克在国内政治和民生领域完全忽视民众的诉求，社会矛盾持续积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日益加剧。这种局面最终导致民众不满的爆发，并使得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在这个意义上，埃及变局可以说是美国在中东谋求霸权地位的必然结果。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不可能再像穆巴拉克一样实行完全亲美、亲以的外交政策。由于埃及军方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以及自由派世俗政党和青年运动等政治力量与美国的联系，埃及像伊朗一样实行反美政策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埃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推行比较中立的外交政策，利用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有可能在中东两大对立阵营之外出现以埃及为代表的中间阵营。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也表现出这种倾向。一方面，土耳其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合作，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以此来挤压伊朗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土耳其继续与以色列保持距离，以此赢得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民意支持。埃及变局之后，以沙特为首的亲美阵营受到削弱，而且还面临着巴林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伊朗虽然因为埃及变局和巴林局势的演化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但是以伊朗为首的反美阵营因为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也呈现出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如果埃及和土耳其能够形成真正的中间阵营，将对中东地区局势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间阵营为中东各国外交提供了新的选项，而不必在两大阵营对立中被迫选择一边，这为中东国家本身以及区域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更多中东伊斯兰国家有可能加入中间阵营。一个日益强大的中间阵营，会起到平衡器的作用，避免某些热点问题激化。

六、结语

以伊朗为代表的亲美阵营，其核心是伊朗模式，政治上实行伊斯兰民主，外交上反美、反以。在中间阵营中，现存的比较成熟的是土耳其模式，政治上温和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通过选举和议会道路拓展势力，外交上温和中立，经济上通过开放实现较快增长。埃及变局意味着以政治专制、外交亲美亲以特点的埃及模式已难以为继，埃及有可能在长期演变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模式。目前在亲美阵营中存在的沙特模式，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因此，以沙特为代表的亲美阵营、以伊朗为代表的反美阵营和以埃及、土耳其为代表的中间阵营并立，实际上反映的是伊朗模式与土耳其模式之间的竞争。三个阵营和两种模式并存的格局，其实质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独立自主倾向增强和实现发展的需要凸显。越来越多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追求以独立自主和发展为

导向的国家战略，客观上将促进中东地区多极化倾向的发展，从而削弱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中东变局催生的新战略格局可能是“三个阵营并立、两种模式竞争、美国霸权地位削弱”。在这种新的战略格局中，中国应该以尊重独立自主、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础，有重点、分层次地推动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Imad Harb. The Egyptian Military in Politics: Disengagement or Accommodation? [J].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2, Spring 2003.
- [2] Sufyan Alisa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Egypt[EB/OL]. [2011-03-20].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mec5_alissa_egypt_final.pdf.
- [3] UNFPA, Egypt[EB/OL]. [2010-08-12].
<http://egypt.unfpa.org/english/Staticpage/54790f72-6e8b-4f77-99e2-4c5b78c20d5c/indicators.aspx>
- [4] Paul Rivlin. The Uprising in Egypt: Poverty,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EB/OL]. [2011-07-23].
http://www.dayan.org/pdfim/TA%20Notes_RIVLIN_FEB10_11.pdf
- [5] 王湘穗. 危机深化与全球转型：阿拉伯地区动荡原因及走势研判[J]. 战略观察, 2011(4).
- [6] Amr al-Shobaki.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Arab World[M]. Beirut: Center for Arab Unity Studies, 2011.
- [7] Mustafa Bassiouny and Omay Said. A New Worker's Movement: The Strike Wave of 2007[EB/OL]. [2008-09-12].
<http://www.isj.org.uk/?id=429>
- [8] Jalal Amin. Misr wa al-misriyun fi ahd Mubarak[M]. Cairo: Dar al-Shorouk, 2011.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Case of Egypt

WU Bingbing

Abstract The change in Egypt is a result of three factors: the autocratic rule of Mubarak regime is challenged by the globalizati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reates severe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problems, which are worsened by the imported inflation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ro-U.S. and pro-Israel foreign policy implemented by Mubarak regime causes resentments among the Egyptian people and stimulates protests. To realiz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and create a stable and sustainable political structure are formidable tasks for Egyptians in post-Mubarak era, and determine that the change would be a long-run process. Egypt would implement a more independent and neutral foreign policy, and to form with some other countries like Turkey a third group, i.e. a group in the middle. A new strategic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would emerge through the change, with pro-U.S. group, anti-U.S. group, and a group in the middle as three main groups, based 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ranian model and Turkish model, and the hegemonic power of the U.S. in the region would be weakened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Middle East Change; North Africa; U.S. Middle East Policy; Strategic Pattern

(责任编辑: 杨 阳)